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 主编 许钧

HISTOIRE DU VAGABONDAGE

流浪的历史

[法] 若兹·库贝洛 著
曹丹红 译

昆德拉说：“一个想要离开自己热土旧地的人是不幸的。”

从中世纪到今天，在滚滚的历史车辙中，流浪者一直以亘古不变的社会扰乱者的形象出现。这一受排挤的人群产生于社会的每一次动荡中：饥荒、流行病、战争、失业……随着时代的变迁，或被推向城市，或被推向农村，总是威胁着定居者和富人的生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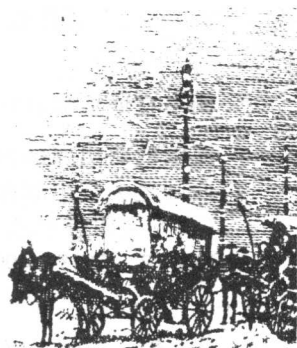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流浪的历史

[法] 若兹·库贝洛 著
曹丹红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Histoire du vagabondage du Moyen Age à nos jours

by Jose CUBERO

© Editions Imago, 1998, 25 rue Beaurepaire, 75010 Paris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5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1-13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流浪的历史/(法)库贝洛著;曹丹红译.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1
(西方文明进程丛书)
ISBN 7-5633-4999-5

I.流… II.①库…②曹… III.流浪-社会问题-研
究-法国 IV.D756.58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02327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临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业北路东段 邮政编码:276017)

开本:960mm×1300mm 1/32

印张:11.375 字数:248千字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2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作者简介

若兹·库贝洛：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已出版著作《本国人和外国人》《艾格－莫尔特大屠杀(1893)》等。

内容简介

在当权者眼中，流浪者代表了不同的现实：从中世纪被视作“天堂守门人”的“基督的穷人”到反秩序的“无依无靠者”，从时有小偷小摸行为的沿途找工作者到依靠乞讨在各节日活动间穿梭的年轻人，这些流浪者引起的社会反应始终是双重的、互相矛盾的。

社会一方面提供着施舍，使这些人重新融入社会的研究范畴，一方面又通过苦役船、苦役监牢、禁闭等措施对他们进行无情的镇压。今天，居无定所者悲剧性的处境又在同一时间促使产生了一些慈善组织的建立和一些镇压性反乞讨法令的出台，反映了社会在面对其“流浪者”时一贯的措手不及和进退两难。

总 序

说起“文明”，似乎下意识地总想到“发明”两个字。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在许多国人的心中，也似乎总是淹没在火药、指南针、造纸和活字印刷这四大发明的辉煌之中。然而，文明这两个字，却负载着异常沉重的历史，充满着难以索解的悖论，在“文明”这两个字的背后，甚至还透着血腥。在 9·11 事件前后，当今世界所经历的一切，到底是文明，还是野蛮？

对这个带有人类存在根本性问题的困惑，促使我开始对“文明”问题有所思考，促使我把目光投向域外，投向西方的文明，投向所谓文明的西方，想要弄清楚到底何为“文明”，西方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文明进程？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基佐曾写过皇皇四大卷的《法国文明史》，他对“文明”这个词有着明确而深刻的理解。在他看来，“文明主要包括两点：社会状态的进展，以及精神状态的进展；人的外部条件和一般条件的进展，以及人的内部性质和个人性质的进展；总而言之，是社会和人类的完善”。按照基佐的这一定义，文明的进程，实际上也就是社会 and 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

社会与人类不断完善的进程,是一个错综复杂的过程。要考察这样一个进程,对整个人类的文明的进程哪怕“稍作正确的叙述”,拿基佐的话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这意味着要对世界“不同民族发生过的事件,对他们本身的历史,而且还要对他们的语言、文学、哲学,最后还要对他们的生活经历的一切方面都具有相当深入的了解”。如此看来,任何人对世界文明的思考注定都是片面的,对人类文明进程的考察也注定是肤浅的。然而,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从人类历史的某个侧面,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进程管窥一二。正是出于这一天真而善意的愿望,我们有目的地聚焦于西方世界的某些历史阶段和西方社会的某些侧面,选择了西方历史学界一些有识之士别具一格的探索成果,以“西方文明进程”丛书的形式奉献给广大读者朋友,为广大读者提供一些观察历史真实的“碎片”,也为广大读者思考文明问题展现独特的视角。

收入本丛书的研究成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撰写的“文明史”。它们不求面面俱到,但求目光独特;不求论述系统,但求思考深刻。而进入我们选择视野的,则是人们在思考文明问题时往往忽视的一些侧面。从收入本译丛的六部书的书名看,除了《书籍的历史》与《西方媒介史》这两部书,其余四部读者似乎很难将它们与西方文明进程联系起来。然而,透过《魔鬼的历史》,作者为我们解析了两千多年来西方历史上魔鬼与恶的化身,通过对魔鬼的概念的追索和魔鬼形象的分析,揭示了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化和知识活动的深层要素。而《镜子的历史》,则是人类和自己的形象的历史,镜子所折射出的是文明的多重含义。顺着《流浪的历史》的踪迹,我们看到的是饥荒、瘟疫和战争中一个独特群体的命运,是仁慈与暴力的较量;在《洗浴的历史》中,作者则以大量史料

和文学作品中提取的生动的例子,描述了西方人“行为举止文明化的进程”,洗浴的历史于是透现出一部“社会文明发展史”。

从这一个个生动而独特的社会侧面,从历史学家们所搜集的历史的真实碎片中,相信有心的读者一定会像本雅明一样,读出自己的一点感悟,窥见文明的几分真相,那残酷而并不令人绝望的真相。

许 钧

2004年12月24日于南京

前 言

穷人、乞丐和流浪者一直以来都吸引着社会的目光。然而在各个时代,这一目光尤其受到社会背景的影响。这一背景中交织着人们的不安甚至焦虑,但在一种真实的慈善之外(不管这种慈善是为了谋求私利,还是出于约定俗成),也交织着真正的互助举动和创造性的时刻。

即使我们想将话题限制在流浪的现象之内,在列提纲时困难已经出现。中世纪的穷人同乞丐、流浪者以及其他放任自己过着一种高度可疑的流浪生活的不幸者之间的分水岭究竟在哪里?因为“真”穷人的高度尊严是毋庸置疑的,在他们身后可能隐藏着基督痛苦的面孔。病人、残疾人或者老人,他们实际上已经融入了社会,而且并没有试图逃脱劳动义务。他们虽受到不幸的打击,但被包容在农村的互助关系里,能够在习惯的地方乞讨。通过扮演使赠予者受益的说情者角色,他们成为了“天堂的守门人”,因此不能将其等同于“假”穷人。“假”穷人是指那些向他们脱离的社会空间非法提出要求的人。

种种原因使然,“假”穷人在“逃离”自己的家乡时也脱离了传

统的互助关系并成为了“无依无靠者”。在中世纪早期,自由民通过“监护人”制度寻找强者的保护,后者在必要的情况下能够向他们开放自己的谷仓。对个人而言,一种类似契约的关系向他保证了最小程度的安全,同时也通过不平等的相互服务关系将他置于一种依附的状态。在这种契约关系中,个人因此能够获得“依靠”,即在互益世界范围内受到承认和保护。一旦这一联系断裂,当事人就成为了“居无定所的无依无靠者”,无可挽回地成为了游民。在一个自认为由三个等级和谐构成的社会里,作为真正的社会标尺的体力劳动义务成为了每个地位低下者的必需。拒绝履行这一保障社会“和谐”的义务,不仅表现了下等人对社会一种本质上的反叛,同时还使“和平”受到了威胁。从此,身体健全却四处招摇撞骗的“假”穷人——这些巡游的乞丐、对城市生活一无所知的流浪者——伪装身患疾病和各种残疾,诈取了本该属于“真”穷人的施舍。作为“无益世界的人”,他们还打乱了上帝想要建立的秩序。

如果说这种区别是逐渐确立的,那么大鼠疫的冲击对此起到了推进作用。早在 1347 年,大鼠疫就已将大批游手好闲的“无依无靠者”移交给了刑事法庭。当时,惊人的死亡率引起了劳工奇缺,“好人”让二世在 1351 年签署了一道法令,开启了一条镇压流浪和乞讨之路,结束了 13 世纪末以来的一场演变。身体和四肢俱健全且在巴黎司法官吏管辖区或子爵领地四处游荡的外地“游手好闲者、无赖和凯芒”^①,必须自谋生路或者在三日之内离开这些地区。从那时起,人们开始不知疲倦地运用这种办法,尽管当时发布了一连串各式各样的敕令、法令和公告,这种办法的主要作

^① 凯芒和凯玛娜,原文即 cayman 和 caymane,中世纪法国对流浪者的一种称呼。——译者注

用却是导致了流浪的产生。“无依无靠者”受到了强迫劳动的威胁,在15世纪,他们甚至以被锁到苦役船上相威胁,不管提出这个主张的是王室还是诸如朗格多克等地的三级会议。同时对居无定所的“价值不大的人”和“没有职业和身份的人”的追捕也日趋加紧。第一个慈善时代过去后,“管制穷人”的时代来临。

尽管镇压机器极其残酷,但镇压的效果很不明显——在惩罚的全副甲冑中,驱逐只是加重了流浪问题——对权力机关命令的反复重申本身就表现了这些命令的无效性。虽然当时乞丐人数大约只占城市人口的10%,个人的施舍逐渐遭到了当局的反对,人民和有可能犯轻罪的流浪乞丐之间有时存在着摩擦,但中世纪遗留下来的基督教文化一直在抵抗着。某些产业主毫不犹豫地给流连巴黎的流浪者提供住房证明,面对面直接施舍的行为也一直持续着,因为有一件事是千真万确的:明天的不确定性使每个小百姓都成为了一个潜在的流浪者。

由于修道院的努力,镇压政策因施舍的定期有规律的分发(这一活动至少导致了穷人的巡游)和济贫院慈善体系的存在而得到缓和。济贫院慈善体系在弗朗索瓦一世统治时期开始世俗化。路易·比维斯在他的《论对穷人的救济》一书中可能第一次从世俗的角度对慈善问题作出了解答。在他所构想的理想社会中,秩序是至高无上的利益,先于穷人应得到的公平。从那时开始,救济制度的改革首先必须考虑到公共利益。由于逗留在大城市尤其是巴黎的流浪者都被迫离开城市,王室为了解决由他们的逃亡引起的流浪问题,在1556年建立了“本地救济”的概念。从此,被驱逐的流浪者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只要他们是“真”穷人,其家乡就应该给予本该属于他们的救济。

1611年在巴黎、1614年在里昂出现的第一次禁闭的尝试显示

出了这些措施的失败。1611年,当“流浪者、懒汉和凯芒”接到命令要求他们在一星期之内离开,乞丐——这些基督的“真正”穷人则受到邀请重返济贫院。在乞丐问题上并没有取得多大成功!当蓬波纳·德·贝利耶夫尔在1656年重新鼓励“大禁闭”政策时,尽管执行了各项措施,尽管有划苦役船的刑罚威胁着累犯,这一禁闭政策还是遭到失败,因为它在向穷人发威的同时也禁止了一种产生乞讨和流浪的贫穷。

在整个18世纪,王室一意孤行。由于虔诚的举动减少,指定给教区教堂的施舍消失,馈赠和遗赠濒于破产,国家只能一味强调一种镇压性的政策。这一政策最终促使了1764年乞丐收容所的建立,后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视为劳改监狱。在杜尔哥任财政总监时期,收容所暂时被取消,之后转移到大革命者手中。大革命以革新的方式承认“穷人对社会有权利”,使得社会在放弃慈善观念的同时具备了现代性。

然而,尽管由拉罗什富科-利昂库尔公爵这一“开明”贵族领导的制宪会议乞讨问题委员会作了许多出色的调查,尽管其他大革命议会继续了这些调查,当局的目标一直是根除乞讨,当然还包括根除流浪的行为。根据执政府和第一帝国时期的法律,乞讨和流浪的行为明确被定义为刑事犯罪。

大革命一直在生存权利、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之间徘徊。在作了一些必要的改动之后,大革命维持了慈善工厂以便向健全的穷人提供工作。如果说它为老弱病残人员组织了公共救济,那么工作的义务也成为了一种必要,尤其是行会制度的废除在它看来排除了劳动市场的所有障碍。当流浪问题进入了越来越复杂的、包括不可告人的政策阴谋和社会恐惧在内的问题体系之后,一直要等到19世纪90年代工作手册被取消——之前没有工作手册就

意味着是个流浪者——失业者的概念才开始出现。这一概念指的是一个被排除于工作之外而非厌恶工作义务或者说工作需要的反叛者。至于乞讨这一轻罪,一直要到1994年新刑法典开始实施时它才从法律条款中消失。

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流浪者——既是地理范围的也是社会范围的——一直持续不断地涌现着,但当事人很少有自发言的时候。一旦发言,总是在被捕时或在法官面前,受到逼迫和强制,被责令为他们的生活方式辩解或为某起偷窃事件负责时。他们不仅出现在警方和司法部门的资料中,还出现在其他法律文本中:从王室法令到共和国的法律,从维持公共秩序行动的地方长官的汇报到省长的报告。但是,如果说不管性质如何,这一类型的目光是来自当权者,那么人民大众在同乞丐和流浪者的接触中,有可能通过诸如1789年的陈情书或者议会的愿望等表现出在特定背景下产生的态度。有时,由恐惧导致的见证甚至将流浪者描写成了暴乱分子,时刻准备投入象征社会复仇的革命中。不过我们会发现这些例子相当罕见。

如果仅限于这一类型的资料,流浪者的形象似乎显得尤其消极,事实确实如此:他们远没有被当成受害者,却似乎成了引起社会不稳定的一个强大因素。中世纪的宗教人士、文人、编年史学家,16世纪的基督教思想家,17世纪的虔诚者,启蒙时期的哲学家,19世纪的慈善家、社会改革家、医生或者社会学家,他们塑造了一种意义更广泛的形象,不管他们是高声表达了自己的敌意甚至仇恨,还是以自己的意愿呼唤能毁灭流浪源头但又不致使人类尊严受到伤害的改革的到来。

但是,与此同时,某些受到社会承认的传统在当局眼中也有可能成为一种不被容许的流浪。这些传统正表现了区分“无依无

靠者”和被认为已融入社会的人民之间界限的不确定性。在 15 世纪,行会的学徒们醉心于可疑的“出门见世面”的实践——尽管这已成为一种惯例,而十七八世纪,朝圣本身也遭到了怀疑,因为王室和教会一致认为朝圣太容易使人摆脱父母亲的管教和降落在每个人头上应有的社会责任。至于 19 世纪对建造铁路或其他大工程不可或缺的巡游工人,或者那些生活条件艰苦、四处找工作的人,一旦被记入宪兵队的报告,他们也成为了流浪者。

这意味着资料来源的多样性,或者说一些投射在流浪世界的目光的多重性,甚至是复杂性。尤其是这一主题位于政治、经济、社会学、学术甚至是意识形态的各种资料的交点上。战争、饥荒可能会引起社会痉挛而产生大量的流浪者,同时流行病或者干脆就是贫困——考虑到当时的技术状况、人口的超负荷都可能引起贫困——也是产生社会痉挛的原因。社会变革本身也促使了新的目光的产生。因此,如果说大革命努力铺垫了第一个福利国家的基础,那么在 19 世纪,事实上是资产阶级将“劳动阶级”视为了犯罪分子,并且理所当然地在这些阶级身上看到了背井离乡、逃离社会控制的“新野蛮人”和“流浪的乌合之众”的形象。

与流浪的历史同时出现的有米歇尔·莫拉或者阿朗·福雷斯特的关于穷人的历史,布罗尼斯瓦夫·盖雷梅克关于边缘人和无赖的历史,或者路易·舍瓦利耶关于劳动阶级的历史,流浪的历史对每个时代排斥现象的形成提出了质疑。但与此同时,除了描述不属于任何组织的流浪者,这些历史著作通过揭示各个阶级阶层向我们展示了整个社会领域。社会从同情和慈善转向了一种越来越明显的敌意,但并没有因此而停止互助的举动。之后,当对流浪者的恐惧在农村经久不散时,超然于流浪者团体之外,也与之没有冲突的启蒙思想家为大革命提供了精神上的武器,这些精神

武器使得人们能够想像一种从慈善中抽离出来的但又不放弃镇压的救济体系。这是一次短暂并遭流产的尝试！因为 19 世纪重新把对流浪者（真正或假设）的控制当作了权利斗争的一项赌注。

最后，在“三十年辉煌”的好时期过去后，我们怎么能够不注意到直至今日的流浪的永恒性？战后缺衣少食、物资匮乏和定量配给的难关被攻克之后，经济增长——尤其是 20 世纪 60 年代的经济增长——似乎消除了贫困，此时热情、风趣、充满哲学智慧的大城市流浪者取代了从前的流浪者。然而，继神父皮埃尔于 1954 年寒冷的冬天为无家可归者发出警告的呼喊之后，贫民窟仍然继续在巴黎周围扩张；1956 年，弗雷辛斯基神父建立了第四世界困难援助会。事实上，在“危机”的冲击下——到底是一种“危机”还是一种由全球化速度加快引起的变革，在这里并不重要——新的穷人重新占据了社会空间，并且随着不稳定性和排斥性的加重，居无定所者再次出现。不管他们是定居的——虽然他们名为居无定所者——还是朝着阳光、海滨或者艺术节城市迁移，一个夏天的时间，他们占据了昔日一直遭人厌恶的流浪者的位置。

交通自由和进入城市的自由不容置疑，因此特别受到牵连的城市政府以禁止乞讨作为应对之策，而此时乞讨的行为即将不再受到惩罚。然而，流浪这种未定型的受排斥形式，其历史向我们展示了镇压性解决方案的无效性，即使所谓的反乞讨法令是建立在公共秩序概念的基础上的。同时，我们也认为这一流浪的历史必须以我们当代的忧虑为尺度得到解读。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世纪早期:受保障的穷人 /1

- 穷人和布道的传统
- 大转折
- 一个拥挤而动荡的时代
- 穷人以及得到拯救的富人
- 城市,穷人的汇集地
- 在蔑视和同情之间

第二章 中世纪晚期:真正的穷人和无益世界的人 /33

- 大鼠疫的冲击
- 凯芒和凯玛娜
- 在流动与流浪之间
- 时代的灾难

- 无业游民
- 乞丐
- 贝壳集团的欺诈行径
- 无益世界的人

第三章 16—17 世纪:禁闭的尝试 /85

- 16 世纪短暂的复兴
- 慈善机构世俗化的趋势
- 在救济与惩治之间
- 路易十四时期的大禁闭
- 总收容所的失败
- 国王的大船,流浪者的苦役

第四章 启蒙时代的回答 /140

- 法律法规的狂轰滥炸
- 虚假的和谐
- 乞丐收容所
- 流浪:从博韦到贝阿恩
- 杜尔哥和启蒙思想
- 面对游民:新的描述
- 大革命前夕经久不散的恐惧

第五章 大革命:第一个福利国家? /195

- 乞讨:一把无声的锉刀
- 意欲“尊重穷人”的大革命
- 生存的权利,还是工作的权利
- 经受考验的大革命
- 救济,工作的权利还是工作的义务?
- 濒临破产的救济制度

第六章 19 世纪:在道路的交叉点 /252

- 第一帝国:法律的严酷性
- 第一次工业革命:流浪的人民
- 慈善派的回答
- 关于工作权利的论战
- 第二帝国:驱逐这群“流浪的乌合之众”
- 由潜在的乞丐走向劳动者
- 移民、行会手工业者、沿途打短工和到处找工作的人
- 总是“波希米亚人”!
- 农村:对游牧民族和流浪者的呐喊!

第七章 20 世纪:流浪者虚幻的结局 /316

- 在全国范围内享受权利的人
- 两战期间镇压势头的减弱
- 向拒绝苦役迈进
- 大城市流浪者与无家可归者
- “三十年辉煌”时期的穷人
- 统计居无定所者的不可能性?
- 现代反乞讨法令

结 论 /330

- 持久性
- 新近目光的演变

译后记 现实与浪漫的矛盾 /335

附 录 大事年表 /339